

流 风 遗 韵

作者和版本

明清小说的繁荣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由明清两代的许多文学家共同创造的，许多文学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那个时候的人们似乎并不十分重视版权，许乡小说是由亲友的传抄而流向社会，或是经若干讲书人反复加工而逐渐成熟的。因此，许多当时或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小说，其作者或是默默无闻，或是生平资料相当欠缺，其版本也不十分清楚。这些明清小说中所存在的空白引起了后人的兴趣，因为研究小说的作者和版本有助于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是文学作品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许多学者对明清小说的作者、版本情况进行了艰苦的发掘和探索，也必然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许多分歧和争鸣。了解这些，会对明清小说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国演义》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可是直到今天，人们对此书的作者罗贯中却知之甚少。那么——

关于罗贯中的身世有何争论？

《三国演义》又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为罗贯中，对此虽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是没有多大争论的。人们普遍认为，罗贯中是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术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依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并结合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了影响深远的《三国演义》。由于封建社会轻视小说、戏曲作家，因而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材料现存的很少，有关问题大部分仍是个谜。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自明清以来，主要有太原、东原、杭州、庐陵四种说法。

“太原”说的主要根据，一是《录鬼簿续编》中关于“罗贯中，太原人”的记载，因其作者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而确信不疑；二是认为传为罗贯中创作的几部小说中着意美化的

人物，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关羽、《残唐五代史演义》中的李存孝、《三遂平妖传》中的文彦博等都是山西人，这显然与罗贯中的乡土观念有关。这一说法因为被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小说史所采纳，故影响最大。

“东原”说以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诸先生为代表。刘知渐在《三国演义新论》中指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一篇“庸愚子”在弘治甲寅（1494年）所作的序文，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早，刻工又很精细，致误的可能性很小。王利器指出，大多数明刻本《三国》都认定罗贯中是东原人；又说，《水浒传全传》中有一个东平（即东原）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惟一精心描写的好官，即是由于是罗贯中的同学之故而精心安排的。

有学者说，罗贯中原籍太原，其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

又有学者说，罗贯中原籍东原，值元末动乱，山东兵起，遂迁居慈溪、庐陵。庐陵则可能是罗贯中晚年最后落籍之地。

关于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有元末明初、南宋末年、元朝、明朝几种说法。

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是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此说认为，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像《三国演义》这样成熟、精细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在宋代和元初的。因为那时白话小说还处在十分幼稚的阶段，基本上是说书人的底本，还很粗糙、简略，何况《三国演义》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塑造，都明显吸收了“讲史”和三国戏的一些有用的成分，从某种意义讲，是它们发展的结果。至于它的下限，也决不可能在明代中期以后，因为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当时已刊印出来。所以，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较为妥当。再说，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巨著，如果没有非常时代、社会对作者感情的强烈触动，没有理智上的

明确需要，是根本不可能写出来的。《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生活在元末明初这样一个非常的时代和社会之中。

南宋末年人说。明朝嘉靖进士田汝成《西湖游览》卷二十五明载：“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辑小说数十种……”随后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袭用田说，亦认为罗贯中系南宋末年人。

元朝人说。有人统计，《三国演义》共引用三百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平话很近似；其所引用诗词，不署姓名，多用“后人”、“史官”或“唐贤”、“宋贤”，却不见用“元贤”一类字眼。有学者据此认为，此乃元人口吻，表明作者为元朝人。另一方面，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几个笔误外，其余的全与元代行政区划名称相符，这也表明该书作者为元朝人。

明朝人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今地名”乃是杂抄元人旧籍注文，故意拟元人口气，借以取信于人，这是伪托古本的人都会干的。

尽管对罗贯中身世有很多争论，但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这样认识罗贯中：罗贯中生活于 14 世纪，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张士诚有关系，是一个“有志图王者”。他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有抱负、有理想并有一定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物。他的创作才能也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戏曲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但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方面。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

《三国演义》的产生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在民间流传，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流行，而且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宋元时，三国

故事被大量搬上舞台。三国故事流传既有那么长的历史，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平话小说，可能很早就产生了，但今存最早的也是惟一的一部《三国志平话》是元代至治年间（1321年—1323年）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书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从内容和结构看，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不仅“拥刘反曹”倾向突出，而且刘备、关羽、张飞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气息，诸葛亮善于神机妙算……但本书描写粗枝大叶，文词鄙陋不通，人名地名甚多谬误，似乎还是未经文人润色的民间艺人作品。从这些情况看，可知从晚唐到元末，在民间流行的三国故事，愈来愈丰富，这一切，为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时期（1522年—1566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它集中并充实了宋元时期讲史话本和戏曲中的精彩部分，并改写或删除了《三国志平话》中如司马仲相断狱、孙秀才发现天书这类荒诞的故事，增加了许多史实，扩充了篇幅，从而成为一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长篇巨著。

继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新刊本大量出现，它们都以嘉靖本为主，只做了些插图、考证、评点和文字的增删，卷数和回目的整理等工作。清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江苏人毛宗岗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辨正史事，增删文字，更换论赞，改回目为对偶，至于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动。经过这一番加工后，全书“拥刘反曹”倾向更为突出，封建思想也有所增加，但全书的可读性又有所提高。从此，号称“第一才子书”的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

《水浒传》的著作权究竟应属谁，历来就有争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王利器为代表的“施说”和以罗尔纲代表的“罗说”。那么，两种说法中哪一种更有说服力呢？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施说”的代表王利器著书《耐雪堂集》，把《水浒传》的著作权给了施耐庵；而“罗说”的代表罗尔纲则把《水浒传》的著作权给了罗贯中，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对“施说”一一进行否定。

罗尔纲对“施说”中“施惠即施耐庵”这一说法尤为反对，他引钟嗣成《录鬼簿》中吊施惠的《凌波仙》散曲为证。该曲道：

道心清静绝无尘，和气雍容自有春，吴山风月收拾尽！一篇篇，字字新，但思君，赋尽《停云》。三生梦，百岁身，到头来，衰草荒坟。

罗尔纲说，钟嗣成写的小传和吊曲都提到了施惠的生平。施惠是个“以坐贾为业”的商人，为人“和气雍容”，好风月，“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此人断不是以歌颂农民起义为内容，包含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和丰富的军事知识的《水浒传》的作者。

罗尔纲认为罗贯中是一位“有志图王”、有高远政治理想的思想家；写《水浒传》的目的在于鼓吹革命，“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关于罗贯中为《水浒传》原本著者的证据，罗尔纲举出了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的许多相同点，其中许多诗词，几乎完全相同。

持“罗说”的还有何心，他在《水浒研究》一书中揭示出罗贯中的《龙虎风云会》杂剧中的词句与《水浒传》中的某些相同之处，并指出，他所列的五项相同之处，虽算不上强有力的证据，但也不能说是偶然巧合，假如《风云会》确为罗贯中所撰，则《水浒传》也是罗的著作，或曾经是他编纂修订过，似乎更无可疑了。

持“施说”的张国光教授则认为：“罗贯中原是元明之间的戏剧家，他决不会是《水浒》的作者，因为元末明初不会出现长篇白话小说《水浒》。”持该论的刘冬、张惠仁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为总结张士诚起义的经验教训而作。

上述各家的说法，证明著作权应归罗贯中的材料，多少还有一点，而证明著作权归施耐庵的，则未提出什么证据。

不过，何心所举的五点“相同处”，有失之牵强之处。小说、戏剧中用语相同是常见现象，而何心所找的“证据”连他自己也说“未能十分满意”。罗尔纲的论证更难成立。第一，他是从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来考虑的，但仅凭王圻说罗贯中“有志图王”这个传言，就断定罗贯中著书是为了改天换地，再造乾坤，就未免失之武断。第二，罗尔纲用《三遂平妖传》来证

明罗贯中为作者也欠妥。《平妖传》把王则领导的农民起义诬之为“妖”，表彰平“妖”的功臣文彦博，这恰恰证明罗贯中是拥王而不是“图王”。第三，不能以诗词相同为依据，古代小说中的诗词多互相抄用，雷同者多。第四，《平妖传》基本上应算是冯梦龙编纂的。

事实上，古时的小说大都是不署名的。古代文学作品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民间无名氏的作品，一种是文人的作品。民间无名氏作品的特点是“无名”。有些“聪明”的文人会把无名英雄的作品拿来，冠以自己的名字。有时出版商或别的什么人会把无名英雄的作品说成是某名人的。在这种“加冕”赠荣的时候，还要编一些神话，例如胡应麟说：某小说序云“称施某尝入市肆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这可真是胡说一气了。

《水浒传》最初的本子没有署名，但后来开始署名了，出版商就“借名”而著。罗、施都可能是被借的名字。

所以要署罗贯中的名字，是因为罗贯中“编次”的《三国演义》在当时很出名。这本演义，在当时比较粗糙，但却是最受欢迎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上署名“后学罗贯中编次”这个自谦后学的署名倒可能是真的。

要选择署施耐庵的名字，或许因为他可能是《靖康稗史》的编者，在当时也很有名气，于是出版商就打他的招牌。再就是，施耐庵可能是一个南宋时代的说话人，因为他说话的较有名，出版商就说他刻印的小说是“施耐庵的本”。

文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出现，其开创者都是民间无名氏。诗、词、小说均如此。小说，由短故事到长故事，到连续故事，到一说就是十天半月的长篇“说话”，都是无名氏们的创作。

民间无名氏创作出来后，文人们去采风、学习和模仿，但在

郭勋组织人写《英雄传》以前，文人们没有人想到去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更没有想过通过创作长篇小说而出名获利，而宣传思想、寄托哀愁。书商们由刻印唱本到刻印话本卖，把供人听的说话变成供人看的小说。这个工作，多数是书商自己记录说话，然后请书会才人给“打扮打扮”——增加些诗词。

文人们的长处在于诗词。杂剧跟小说的不同在于杂剧需要唱，这就需要“曲”，即需要诗，因而需要“才人书会划新编”。至于小说，我们从王利器所举的书会才人与小说的关系的例子看，书会才人的工作主要是给话本添诗加词。书会才人们也有可能帮书商润色“参订”，所以二十四回《水浒传》署“东原罗贯中参订”。这“参订”或“編集”都说明他们不是作者。

由此看来，《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恐怕很难找到，因为它是无数无名英雄的集体创作。群众的功劳就该归功于群众，不应将群众的功劳算到某一英雄身上，否则即是对事实的歪曲，对历史的歪曲。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水浒传》的版本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它不仅有六个版本在同时流传，而且还存在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那么——

《水浒传》的繁本和简本谁先谁后？

繁本和简本是相对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叙述故事情节时的文字详略不同。描写详细，字数多的为繁本；描写简略，字数少些的就是简本。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繁本系统中一百回本是明代出现的最早的版本，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水浒英雄征剿田虎和王庆的内容，于是出现了一百二十回本，明末又出现了金圣叹删改的七十回本，繁本系统内部的发展脉络基本清楚。简本系统中也有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等不同版本。然而繁本和简本哪一个产生在先，哪一个产生在后的问题，却是一桩不太能弄明白的悬案。

《水浒传》先有简本后有繁本的观点，在学术界居于主流。因为这种观点不仅合乎一般文学的发展规律，而且持此说者不

乏学术权威。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早提出《水浒传》版本由简到繁的观点。他说：

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又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起依托，遂或意为敷衍，是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且是其师。

鲁迅对《水浒传》的几种版本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简本一百一十五回本文笔粗糙，保留初成时的原貌，应该是最早版本，至少也接近于最早的版本。

鲁迅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影响不断扩大，而且成为广大研究者讨论这一问题时的立论依据。郑振铎、俞平伯、宋云彬、何心、聂绀弩等学者都是“简先繁后”观点的支持者。

学术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是“先繁后简”，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孙楷第在 20 世纪 30 年代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校勘，发现容与堂本和钟伯敬评本的正文有的地方作有删节符号，而所见简本则删掉了相应的内容，因而得出结论说“文简事繁之百回本，实就百回本删节”。孙楷第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王根林、张国光、范宁等学者发表文章，重新提出了《水浒传》版本应是“繁先简后”的观点。

张国光在《鲁迅以来盛行的 水浒 简本加工为繁本说的再讨论》、《 水浒 祖本考察》等文章中对由简到繁论和删繁为简

论两派观点的源流及其基本论据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就长篇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是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文字逐渐精细，故事情节逐渐合理、复杂，思想性、艺术性逐渐高。但也有特殊，《水浒传》的演进就是特例，不完全符合上述规律。张国光还援引了明清以来的一些有关史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根据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清人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所提供的材料作为论据，认为《水浒传》出现删繁为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出版商们出于谋利目的而采取了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手段。此外，他还分析了胡适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序》、郑振铎 1954 年的《水浒全传序》等文章，认为郑振铎晚年对《水浒传》版本问题的提法已有所改变。

这样一来，删繁为简说的呼声很高，国内学术界很多人倾向此说，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赞同此说。但是，《水浒传》版本中的繁本简本谁先谁后的问题并未有最后结论，讨论仍在进行中。

《东周列国志》是流传相当广泛，影响相当深远的一部小说。这部书不是由一人一次完成的，而是从明到清在上百年的时间内由多人逐渐完成的，其过程饶有趣味。那么——

《东周列国志》是如何写成的？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东周列国志》，是在明人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的基础上，由明人冯梦龙改编为《新列国志》，再由清人蔡元放改编而成的。

早在宋元的讲史话本中，曾有《七国春秋平话》和《秦并六国平话》，都是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故事的，当然很简略。明人余邵鱼吸取前人话本成果，再参照《左传》所述历史，经过加工，编写成共有二百二十六节，不计回数，起于“苏妲己驿堂被魅”，终于“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列国志》，共有二十八万多字，使列国故事初具规模。明人陈继儒在《叙列国志》中说《左传》记载，史事若晦若明，经过稗官野史、渔歌牧唱的努力，使其“事核而详，语俚而显”，可以“补经史之

所未赅”。《列国志》采入了不少根据民间传说的故事，叙述生动，很有文学意义。

到了明末，文坛怪杰冯梦龙特别热衷于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改编工作，由于才情跌宕，善属诗文，生活放浪，性格诙谐，所以其见解与世俗很有些不同。他认为通俗文艺作品可以“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民歌可以“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这些见解其实都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文学主张。冯梦龙有许多编著，影响较大的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他认为余邵鱼的《列国志》过于简略，且有一些内容没有意义，于是着手进行改编。

冯梦龙对《列国志》的改编工作主要是：删去了诸如“临潼斗宝”、“鞭伏展雄”等史无据又十分荒诞的情节；将叙述年代缩短，使作品起于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 789 年），止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使中心史事的起讫，与东周列国名实相符，囊括其间五六百年的大部分历史故事；在弥补疏漏，故事连贯，叙述详略，人名、地名统一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工作；篇幅由余邵鱼的二百二十六节二十八万多字，扩展为一百零八回七十五万多字。经过这些工作以后，冯梦龙将他改编的这部书称为《新列国志》，印行于世。

冯梦龙改编《新列国志》，目的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因为在明末动乱之际，他企图通过改革弊政来实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抱负是无法实现的，因而只能将其寄托在自己编写的通俗文学之中。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因为抵挡不住西戎的进攻，将国都东迁到洛阳，周朝从此失去控制诸侯的力量，于是列国纷争开始出现。《新列国志》就从这里开始写起，直至第八十三回，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充分叙述了春秋三百年间五霸竞起、弱肉强食的大动荡局面。春秋兼并战争的结果，封建家族取代了封建宗族，诸侯兼并让位于大夫兼并，以三家分

晋为标志，揭开了七国雄峙的战国序幕。《新列国志》用后二十五回的篇幅叙写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故事。冯梦龙就这样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兴衰过程为主要线索，在广阔的范围内，生动地叙述了诸侯之间争夺霸权和施行兼并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斗争，以及人们在这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思想情趣和智谋胆略，把这一时期纷乱的历史，既写得纲目清晰，又写得血肉丰满。

《新列国志》流传到清乾隆时，秣陵蔡元放又对其进行了再次加工。他是抱着借历史演义，“引为法诫”，以达到“善足以劝，恶足以戒”的劝诫目的来进行改写的，所以在故事情节的内容上无甚更动，仅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润色工作。他所进行改写的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其中加了大量的宣传正统思想的“评语”。经过蔡元放的评改，作品中便掺进了更多的封建意识，说教的味道更浓了。

我们现在所读到的《东周列国志》，实际上含有余邵鱼、冯梦龙、蔡元放三个本子的成分，而又以冯梦龙本子为主体。

《东周列国志》的成书演变过程表明：从它的最初产生到最后完成，是经历了几个朝代，多次改编的，这就必然将各个改编者的观点渗入其中，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呈现出复杂性；它是历史小说，其中的大量史事是见诸于史籍的，因此在改编时不可能完全进行虚构，必须受到历史史事的限制；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相当丰富，因而编者又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艺术上的需要，对史料进行取舍，充分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丰富史料的本身就包含有浓厚的传说成分在内，所以《东周列国志》已经不是一般的历史通俗读物，而是具有很大创造性的艺术作品了，所以它能够广泛流传。

《东周列国志》具有广博的历史内容，全书结构巧妙，脉络分明。作者抓住重点，剪裁史料，对那些反映时代特征并有借

鉴意义的典型事件，旁采野史别传，加以增饰，详尽铺叙；而对一般史实，只作改写，简略叙过，使全书犹如一条由大大小小的故事扣成的链条，环环相连，把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故事，如齐桓公开创霸业、晋文公周游列国、赵氏孤儿、吴越春秋、商鞅变法、孙庞斗智、荆轲刺秦王等展示得淋漓尽致；而许多小故事，如千金买笑、掘地见母、大义灭亲、曹刿论战、曹沫劫齐、假途灭虢、寒食禁烟、退避三舍、董狐直笔、绝缨大会、二桃杀三士、孙武演阵、卧薪尝胆、杀妻求将、火牛破燕、纸上谈兵、毛遂自荐、奇货可居、甘罗早成等等，写得脍炙人口。